



【广深今谈】

阅读本是极为私人的事情,是否需要以“城”之名来彰显?真正的读书人不需要,但是获取政绩者需要。



【言为心声】

转基因食品的争论表明,中国消费者不缺乏科学素养,也不缺乏民主精神,而是缺乏现代的决策制度。



【念念有余】

行业大佬们支持转基因,说明站在行业前沿的人看到这是一项代表未来的技术,后发者可能被革命。



【缘木求鱼】

报纸是“纸”,有价值的是印在上面的内容,“纸”不过是一个平台罢了。

广州不需要“图书馆之城”的虚名

今纶

酝酿多时,广州计划于2014年正式实施“图书馆之城”规划。此“城”将会展现怎样的面貌?即将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广州市图书馆条例(草案)》目前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据媒体报道,至2020年广州计划投入20亿元建“城”。

广州是否需要“图书馆之城”这个名头,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阅读本是极为私人的事情,是否需要以“城”之名来彰显?真正的读书人完全不需要,但是获取政绩者需要。因此,我可以断言,2020年,广州肯定可以建成“图书馆之城”,甚至会提前建成。只是这“城”中是否真的充盈书香,市民的读书热情是否真的大大提升,那就不得而知了。所以,结论是,广州固然可以而且应该在图书馆建设方面、阅读推

广方面多些动作,但是不要一开头就摆出一副要建“某某城”的姿态,这种姿态其实很容易让人产生丰富联想。

从2014年至2020年广州计划投入20亿元建“图书馆之城”,对于广州这种一年卖地762亿元(2013年数据)的土豪城市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不过,即使是一碟小菜,其实执行过程中还是需要透明公开的程序,预算到位、专款专用自不待言,采购环节也需要更多征询民意,科学决策。这就需要在数据分析方面多下些功夫,图书大数据库的建立、联动需要加速,而且一些环节亟待公开,这里面存在一些可能的暗箱操作空间。如何把这些暗箱操作的空间完全挤压掉也将考验决策者的智慧。

另外,从2014年起至2020年跨越的时段较长,在解决了预算监督和技术性问题(比如采购环节的开放透

明)的前提下,20亿元这个数字是否需要动态变化?这个里面要充分考虑技术升级的冲击、通胀因素,20亿是足够多,还是不够?因此,个人意见是不要具体提这个数字,一方面避免可能的突击花钱,另一方面也留下足够灵活机动的空间;该减就减,该加就加。我这个建议估计又是政绩追求者不欢迎的,因为“名头大”(比如“某某城”)和具体量化的数字才是最容易博人眼球的,而且总结起来更加理直气壮。

“图书馆之城”到底需要多少图书馆?草案提出,常住人口达到10万以上的镇,应当设立独立运作的公共图书馆。除了数量要求,条例草案还对图书馆的建筑面积和座椅数量做了规定。其实,决策者应该调查一下,多少人真的是因为图书馆太远或者太少而不去图书馆的。中山大学课题组的调查显示:近六成半被访者没有去过广

州市的公共图书馆。当中七成人表示,因为没有时间和图书馆离家太远。45.14%的人认为,找书、借还书过程太麻烦,44.4%的人觉得不去图书馆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满足阅读需求。看看,即使有了图书馆,没时间、嫌麻烦和认为根本不去图书馆也照样可以读书的人占了相当的比例。换言之,即使广州投了20亿建“图书馆之城”,但最终或许发现效果一般(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某些图书馆会不会和鄂尔多斯的“鬼城”一样,变成“鬼馆”?纳税人的钱要是打了水漂,谁来负责?

再进一步说,在一个技术变革日新月异的时代,领导们也该把自己的决策系统升级一下,鼓励大家读书,不一定要多建图书馆。在电子书动辄一两元钱的时代,在免费阅读大行其道的当下,在电商底线打折抢市场的今天,在盗版横行的街头(这个当然

不值得鼓励),读书的需求和欲望从未泯灭。读书的渠道是更便捷更经济了,图书馆这种读书空间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是它的扩张并不一定是必须的。

规划赶不上变化,以今时今日的思考维度来预测未来多年的图书馆业态并积极投资建设,变数太多,风险大于收益。我建议有关部门踏踏实实坐下来,摒弃追求“假大空”的虚名,认真做调研,每年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比如探索大学图书馆更多向社会人士开放,比如在外来工聚集的社区就外来工的需求有的放矢地建设一些流动图书馆。

广州是否是“图书馆之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公共资源是否能够在市民读书这个问题上提供真实有效的支持,而且最好能秉持“少花钱,多办事”的准则,如此,则善莫大焉。

(作者系广州政经评论人士)

从转基因争论看我国决策制度的缺陷

乔新生

最近,原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永元和一位科普作家方舟子之间的争论,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双方的争论已经到了非理性的地步,变为人身攻击。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如此荒诞的现象,是因为在中国缺乏科学的决策制度。

过去人们强调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重要性,可是,并不了解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实质含义。科学决策在现实生活中异化为少数科学家的决策,而民主决策则变成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

事实上,民主决策是指公众的话语权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强调的是程序正义。在民主决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各方面的意见,满足公众的知

情权和表达权。而科学决策强调的是决策者的解释权问题,决策者有权对自己作出的决策进行详细的说明,以便最大程度争取公众的支持。但很遗憾的是,一些科学工作者并不了解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实质含义,他们动辄把那些反对他们意见的人称之为缺乏科学常识的人。而一些热衷于公共事务的公众人物,由于不了解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实质内涵,错误地以为只要进行田野调查,听取多数人的意见,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转基因问题上之所以引起巨大争议,根本原因就在于,关注公共事务的公众人物试图通过民意测验,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而从事科普的作家则试图从科学的角度证明自己观点的科学性。这些都不是现代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应有的态度。现

代民主决策的基本含义是允许社会各界充分发表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只要允许人们畅所欲言,那么,就可以去伪存真,就可以在争论中逐步地寻求共识。转基因问题绝对不是少数科学家可以决定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千家万户,涉及每一个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人们有理由关心转基因的问题,有理由表达自己的担忧,甚至有理由反对政府进口转基因商品。

当不同的群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意见不一致时,政府决策就应该小心谨慎,千万不能听取少数科学家的意见,把关系到亿万民众身体健康的问题变成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政府应当充分尊重消费者的表达权,应当以更加严格的法律制度,要求转基因的生产和销售企业在显著的位置标明转基因

食品,允许消费者自由选择。

政府的首要职责是将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区分开来,充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防止一些转基因食品的生产企业把转基因食品当作非转基因食品销售,从而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政府应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公布转基因食品的科学研究成果,尽可能地将科学家分析转基因食品的信息告知公众,让公众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做出选择。在转基因食品生产和消费领域不存在说服的问题,更不存在强迫消费的问题。政府应当增加信息的透明度,从而确保在转基因食品的生产过程中最大程度的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透过转基因食品的争论,我们发现中国消费者不是缺乏科学素养,也不是缺乏民主精神,而是缺乏现代的

决策制度。在现代决策体制下,每个公民都可以自由地选择,每个公民都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很遗憾的是,某些参与讨论的科普作家动辄给别人扣上不懂科学的大帽子,试图以此来堵住他人的嘴巴。这是一种特殊的专制,它会把科学主义变成专制主义。部分公众人物试图发动群众通过投票的方式,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样做实际上是把科学主义变成民粹主义,同样是一种危险的事情。在讨论类似于转基因这样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坚持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原则,一定要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话语权,一定要高度重视决策者的解释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信息的不对称,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满足公众的选择权。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种业大佬为何支持转基因

余胜良

近日袁隆平在媒体上表示正在进行转基因水稻研究引起轩然大波,这对民众脆弱的转基因心态可是一次考验。不过,支持转基因在种子行业拥趸颇多,笔者接触的知名种业人士刘石也支持转基因。

2011年笔者邀请刘石到所在报社进行讲座。在讲座中,他提到一件对他触动极大的事情,有一年到美国去考察,一位美国知名专家对他讲,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将是21世纪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两个领域,现在信息技术的威力已经显现,但生物技术的影响会超过信息技术的贡献。生物技术中,基因无疑是一个核心部分。

有同事询问刘石是否会吃转基因食品,他的答案是:会。

因为方舟子和崔永元骂战,笔者前不久又问刘石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他依然支持转基因食品,“在植物育种中,的确存在基因相互影响的现象,所以育种要隔离,但人吃玉米,怎么可能将玉米的基因转到人身上?”

反对转基因食品者认为,转基因的成果只是阶段性的,隔一段时间就会失效,以抗虫棉为例,现在还有很多病虫害。刘石表示,抗虫棉对抗的是棉铃虫,棉铃虫是棉花最大危害,但是抗虫棉并不能对抗其他害虫,所以种植一段时间之后棉花的二号三号危害地位可能就上升,但这并不能说明抗虫棉不好,“从来没有一项技术是一开始

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而需要一步一步完善。”

在上世纪90年代,喷洒农药每年都会造成我国上万人死亡,其中2/3的农药是用在棉花上,抗虫棉的推广挽救了很多棉农的生命,还减少了环境污染,因为消灭抗虫棉需要喷洒的菊酯类农药有剧毒。刘石曾在孟山都工作,是抗虫棉在中国的推广者。

在中国有不少反对转基因食品者,认为通过传统方法依然可以达到高产量,因此不需要转基因种子。刘石认为,这些传统方法的确可以达到高产量,但是需要特殊环境和复杂方法,对整个社会来讲,想要提高效率就必须可以大规模推广,让农民很容易

学会,所以要用最傻瓜的方式,“就跟衣服一样,量身定做当然更好,但只能供少部分使用。”

实际上,并非所有的转基因种子都有优势,一些水果、蔬菜类转基因种子也曾被推广,最终没有推广开来,原因是没有传统种子表现好。转基因的优势主要在可以大规模耕种的大田作物。

在国内转基因的名声很差,刘石认为,就跟故事一样,带着阴谋色彩的传播最广,人有看灾难恐怖片的心理需求。转基因的名声也被频繁用在商战中,先玉335曾被攻击为是转基因,黑龙江有一个从德国引进的种子,近年推广良好,也被攻击为是转基因。

这可能是比较奇怪的现象,行业

内人士支持转基因食品,行业外人士多拼命反对。按照道理而言,就像我们到医院要听医生的,应该更相信医生判断才对,但是转基因不是这样,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认为医生怀有私利,动机不纯。

反对转基因食品者认为,科研工作者、种子公司可以从转基因推广中谋利,所以不值得信任。并非所有种子公司、科研工作者都能从中谋利,对整个行业而言,转基因会是一次洗牌,转基因推广可能会让国内不少种子公司垮台。行业大佬们不是反对而是支持转基因,只能说明这些站在行业前沿的人看到这是一项代表未来的技术,后发者可能被革命。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纸媒的惶惑

木木

2014年1月1日,上海报业集团属下的《新闻晚报》正式停刊了。与2008年《财经时报》的停刊不同,《新闻晚报》的停刊似乎并没有一个很直接的“导火索”,就这样“平白无故”地自己把自己“干掉了”。

大约是上海报业集团的霹雳手段过于凌厉的缘故吧,市场、读者甚至报社员工的反应都从容、淡定得很,颇有些“大痛无痛”的风范,或许这倒也能从一个侧面证明,《新闻晚报》原本就是无可无不可的那么一张纸?

不过,这次“自戕”,还是在几个媒体基层从业者的微信群里引起了几阵涟漪,议论的指向倒也真的很全面,既

有惋惜、惆怅并推己及人、免死狐悲的,也有凛然说“活该”、说“碌碌无为者早该被踢走”的,更有好事者把李佩钰在2013年10月份的一次将要对《中国经营报》进行颠覆式调整的讲话搬出来,为“活该”做注脚的。

李佩钰的讲话看起来倒真的颇具几分“颠覆”的样子,但细品一品,马上就能读出一丝纸媒的惶惑。这种惶惑感显然并非始于近日,掐指算来,大概在2000年前后,随着大批资本渐次拥入这个行业,随着互联网的日渐成熟、强势,整个纸媒就开始一天甚于一天地惶惑起来,各家报社每年都要绞尽脑汁又例行公事地改版、创创新、搞多种经营,似乎就是对这种惶惑感的最好印证。

或许马上就会有人跳起来反驳,“改总比不改好”、“变就比不变强”,也是,这样的反驳似乎还真是挺难反驳的。

不过,欧洲各地几百年未变的古堡,中国北疆上千年不倒的长城,倒一直是旅游热点,在或徜徉彳亍,或攀汗登攀的人群中,也一定少不了这些反驳者的身影。人真的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总是习惯性地脚踏着“变动”、心追着“永恒”。或许,这恰恰就是人类的宿命——“变动”是手段、“永恒”是梦想?也未可知,很艰深的一个哲学问题。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现实中惶惑着的纸媒们,绝非困窘于这个难解的哲学问题,因为总是整天忐忑于“温饱”、忐忑于“温饱”会被“妖怪”无情剥

夺的人,哪会有心思琢磨飘在半空中虚无着的“哲学”。

这大概就是纸媒们惶惑的起点吧,再顺着这个起点往下想,就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纸媒,对自己的读者几乎都处于无法把握的尴尬境地:不知道谁在买报纸,不知道谁在看报纸,更不知道那个人的学识水平、经济状况、职业前景……总而言之,几乎什么都不知道自己!在这样的状态下,要想“有的放矢”,要想“从客户兜里想方设法地掏出更多银子”,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这样的状态下,面对一个个新鲜杀到的劲敌,不惶惑倒真的很奇怪。报纸是“纸”,有价值的是印在上面的内容,“纸”不过是一个平台罢了。过去,这个平台或许真的无比重要,也

无比强大,但是,当这个平台已经很难适应新世界的时候,当技术的发展已经为搭建新的平台做足了准备的时候,当新技术支持的平台能够一扫曾经的劣势并让我们“心明眼亮”地看清楚读者的时候,我们又为什么非要留恋这张“纸”不可呢?长城值得永恒,这张“纸”,真的不必永恒。

李佩钰在“颠覆性”讲话的最后呼吁员工,“传媒永远是热血的行业,必须要让青春都燃烧起来”。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青春”总在那里一代又一代地燃烧,关键在于将要照亮的是什么;而且,如果没有合适的平台,燃烧或许也就真的仅仅是白白地燃烧罢了,又遑论照亮什么、启迪什么!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